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马基雅维里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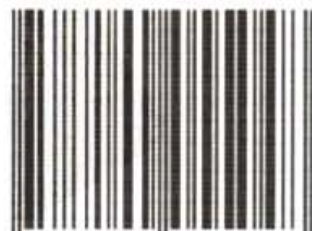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http:// www.ep.com.cn](http://www.ep.com.cn)

ISBN 978-7-100-05504-8



9 787100 055048 >

定价：36.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马基雅维里主义

“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  
现代史上的地位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德)迈内克著；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5504 - 8

I. 马… II. ①迈…②时… III. 马基雅维里, N. (1469~1527)—哲学思想 IV.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670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基雅维里主义

“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时殷弘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504 - 8

---

2008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sup>1</sup>/<sub>8</sub>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6.00 元

*Fridrich Meinecke*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R. Oldenbourg Verlag, 1924

根据 R. 奥尔登堡出版社 1924 年德文版并参考其英译本译出  
经泰勒与弗朗西斯图书公司 (Taylor & Francis Books Ltd) 授权使用其  
英译本编者导言

*Frid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Douglas Scott and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in 1957,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Friderich Meinecke's work by

Dr. W. Stark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0 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 36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 4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谨以此书纪念恩斯特·特勒尔奇

# 目 录

英译本编者导言	1
导言	51

## 第一篇 幼年专制主义时代

第一章 马基雅维里	81
第二章 让蒂莱和博丹——马基雅维里在法国的最初反对者	112
第三章 博泰罗和博卡利尼	132
第四章 康帕内拉	164
第五章 “国家理由”观念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传播	200
第六章 黎塞留时期在法国的“国家最佳利益”观念	237
一 开端和 1624 年的《论君主和国家》	237
二 亨利·德·罗昂公爵	257
第七章 加布里埃尔·诺代	299

## 第二篇 成熟专制主义时代

第八章 略论格老秀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	313
第九章 普芬道夫	334
第十章 库尔蒂兹·德·桑德拉斯	359



## 2 目 录

第十一章	鲁塞·····	375
第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大王·····	394

### 第三篇 晚近德意志历史中的 马基雅维里主义、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

第十三章	黑格尔·····	483
第十四章	费希特·····	517
第十五章	兰克·····	525
第十六章	特赖奇克·····	544
第十七章	过去和现在·····	567
人名索引	·····	598

# 英译本编者导言

W. 斯塔克博士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寿比人瑞。他 1862 年出生时，其德意志 xi  
祖国尚未实现长期追求的、在一个共同的德意志帝国内的统一（的确，行将确定这帝国的范围和政治特性的两大决定性战役——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尚未进行），而当他于 92 年之后即 1954 年去世时，德意志帝国已走完了一整个生存怪圈。它在俾斯麦治下度过了短暂和辉煌的凌晨时光，在威廉二世治下经历了闷热浮躁的正午暑浪，接着熬过了战争和革命的磨难，步入阴影越拉越长的魏玛共和国午后，最后跌入专制暴政的黄昏，在 1945 年的决定性败北中被支解和翦除。迈内克目睹了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而这些事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本人——不仅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德国人，而且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这虽然听起来似是而非，本质上确是朴素的实情。对迈内克来说，身为一名历史学家并不意味着活在往昔，或者思想情感眷恋往昔，而是首先意味着直截了当地投身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现实生活，感受其风云冲击，经受其暴雨洗礼。受到被称为“生活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一个极难翻译出来的术语）的思想运动的深刻影响，并且靠近威廉·狄尔泰之类思想家，迈内克将历史研究更多地看作是整个人格的经验，即以设身处地似的理解来参与先前时期里人们的斗争，

## 2 英译本编者导言

体验其希望、恐惧、挫折和成就，而不那么是人类智力的操作。他确信，历史学家只有经由当今之门，才能进入往昔之地。这就是说，只有全心全意地进入当今现实，才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什么真正重要，而这意思是在他试图把握往昔的现实时需要的。任何采取别种做法的人，任何以书蛀虫的心态习惯来查阅史料的人，都将无法同已逝年代里的活生生的力量建立起真正的联系，都将忽略现在和过去的极为本质的东西，而且确实将是一个处理僵死之物的无感觉的人。这样一种态度使学者肩负重担，承受一种极少有人喜欢承受的磨难。它将他推出平静的课堂和风雨不入的书斋，推到至少是政治行动舞台的边缘。迈内克一生都置身于这个舞台，从参与1908年的一项谴责威廉二世的动议，到深切同情1944年的反希特勒密谋。<sup>①</sup> 他的著作中的精华，有许多正是出自这种与历史本身——实际发生的历史——的贴近。

在有些时期里，对于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整个这种态度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同情，而在另一些时期里，此种态度只是例外，一般饱受非难。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较年轻时，它简直就是犯忌。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们同其他学者一样，处在两大趋势影响之下：其一源于赫尔曼·科恩和保罗·瑙托尔普的新康德主义，其二来自更为有力的西方实证主义，卡尔·兰普雷希特之类很有影响的人物便是它在德国的化身。尽管这些哲学彼此大不相同，也尽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始终必定截然有别，但它们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力图迫使历史研究者将他同史料的关系当

---

<sup>①</sup> 《施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1949年版，第124页往后；《德意志的灾难》，1946年版，第145页往后。

作一种明确的主体-客体关系。迈内克全不听从那一套。对他来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恰恰在于弥合旁观者与被旁观的生存之间的鸿沟,亦即克服别人认为是唯一“科学的”主体-客体关系。他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能够或应当采取有如天文学家和植物学家那样的“客观”态度。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努力自我克制(实在是自我屈辱),以此尽量对自己研究的事实无所“动心”的历史学家,必定变成一位古物研究家,一位枯死事实的搜集者,好比历史的捡破烂人。他坦率地写道:“一种不带价值取向的历史编纂要么只是资料汇集和史学本身的预备,要么——倘若它自诩为名副其实的史学——给人枯燥无味的印象。”<sup>①</sup>在其成名作《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的序言里,他如此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本书基于这么一种观点:德国的历史研究必须再度升华为较少拘束的探讨,接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大活力,而不遗弃自己在治史方法上的可贵传统;它可以更大胆地进入哲学和政治,而不损害自己最深层的内在性质和目的。”<sup>②</sup>这是一份宣战书,宣战对象是所有那些为数众多、认为史学无非是往事的精确写照和事件的单纯如实登 xiii 录的人们。对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来说,史学绝非如此。在他看来,它大可以说是一种深切的人类关怀,我们无法不变得在思想和情感两方面都介入其中。这再次有助于说明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的书从来不是枯燥无味的。他向我们展示了生活,连同其所有令人大为痛苦的困难。历史在他眼里从来不像柔畅平静的稳流,而是始终变动不熄,永无确定,疑难丛生,危机不断。他治史的

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历史杂志》第137卷(1928年),第8页;重刊于《能动的明镜》,1948年版;参见第230页。

② 1922年版,第vi页。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4 英译本编者导言

特殊风格或许最鲜明地见于他的某些不大重要的著作,例如《德英同盟问题史(1890—1901)》。<sup>①</sup>在其中,英德两强之间谈判的史事更多地是从德国一边的外交家,而非超然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视角来考察。这样,读者就能够设身处地似地感受那相互斗争的意志间的张力,参与那正在围绕着柏林和伦敦的会议桌演出的冲突活剧。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迈内克不懂历史学术与政治时评的区别。他同样有自己的关于客观性和正直的理想,但它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理想,后者在他看来不过是呆板地仿造一种仅仅在自然科学中为人熟知的态度。对迈内克来说,客观不等于没有见解,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没有见解,即使一个将自己变成了某种活的录音磁带的人有可能如此。客观意味着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控制自己的情感,变得甚至对敌人也公平合理。迈内克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也许并未全盘成功,而这就是他吸引人的第三个原因。他一向坦陈直言,但从不轻率盲目。他从未使人当众受辱,从未向人讲道说教,但也从未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人类行动都这样或那样地同等合理正当。

迈内克以一个短小精悍的说法,很好地抓住了他的这一治学理想的精髓。他说,历史学家应当是 *ein schaffender Spiegel*<sup>②</sup> (一面能动的创造性的明镜)。实证主义和康德主义都要求历史学家充当一面没有生命、消极被动的镜子,毫不失真地反映它面对的形象。然而,只有自然现象才能以这一方式记录下来,人的奋争则

---

① 1927年在慕尼黑出版。

② 这是1948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的题目。

不能。人的奋争只会向有同情感的观察者展示其奥秘,这样的观察者既能观察,也能理解。迈内克的抱负就在于要使自己的历史学著作,连同所有历史学著作,成为在往昔造就的历史的某种再创造,而单纯的讲述历史不会使他满足。他同任何人一样明白此等努力永无可能完全成功,但他确信历史学作为一种人类研究,其价值取决于这努力成功的程度。如果说他盘旋于政治大锅边缘,在此过程中烧灼了自己的翅膀(希特勒当权时,迈内克蒙受了贬抑和耻辱),那么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对政治竞技本身有兴趣,而只是因为他相信,参与现今事务能使他更好地将勃勃生气注入他对往昔事务的讨论,更好地使他的历史著作具备活力。诚然,他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是一位特别的历史学家,特别就特别在他努力争取一种有想象力的、“历史探索与当代经验的协作”。<sup>①</sup>

一种如此牢固地与同时代事态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学识,不可避免地会在内容,特别是情绪气质方面受到时事起伏动荡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因为迈内克在世的那 92 年充满着残酷无情、震撼世界的事件。有如一架地震仪,他的心灵登录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震动,但有两大灾变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尤为深刻的烙印,那就是 1918 年和 1933 年的灾变。直到 1918 年为止,世界在迈内克看来有如一副愉悦的笑脸:他的早期著作被一种欢快的乐观主义感染,洋溢着热情和兴奋。说到底,这种得意感归因于 1871 年创立帝国 (*Reichsgründung*) 的经验,它像醉人的醇酒一般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一个产生了像俾斯麦的帝国那样辉煌成果的世界能有什么毛病? 1907 年首次出版的《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一书,带有一

<sup>①</sup> 《“国家理由”观念》,1925 年版,第 530 页。参见下面第 424 页。

种和谐、满足的哲学的印记。1918年以前的兴奋有多强烈，由这年的灾难招致的颓丧就有多严重。像这个时期里那么多其他德国人（例如马克斯·韦伯）一样，迈内克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他从中解脱出来，怀着改变了的眼界和看法。在他看来，生活不再像圣诞老人，而像是互相敌对的势力争斗拼搏的战场。他在20年代的人生哲学是内在分裂和对立的，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摩尼教式的。迈内克虽然仍渴求维持自己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倾向，但越来越不得不承认历史中存在黑暗的、恶魔般的力量。强权与公理彼此间不再像它们在1907年时候那般被视作最终和谐的，而是不可更改地处于持久的殊死搏斗之中，没有原因，没有终结，也没有胜败。这十年里他的伟大著作——《现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是一部不愉快的书。不过，迈内克仍未触及谷底。1933年，事情有了新变化，即变得更糟。说它给迈内克带来了严重磨难也并不过分。他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洪堡、赫尔德和歌德的追随者，却发觉自己一头撞进了虐待狂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的时代。他的著作在

xv 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探寻他自己所称的 *Geschichtstrost*——“历史学家的慰藉”。难道对往昔的研究到头来不会发现某种征兆——不管它多么不确定——提示光明的力量并非总是注定要在同黑暗势力的争斗中失败？迈内克30年代的著作有一种悲苦意味。但尽管如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它被某种占据了迈内克内心的镇静所抵消。日渐垂老导致沉着和逆来顺受，但研读伟大的经典，尤其是歌德的经典也使得心绪更为平静，而我们的作者于1936年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历史主义》，正是以论说这位伟人结篇。迈内克苦思冥想，尝试摸索出一种关于现实的半宗教观念。第三帝国的崩溃使他能够摆脱被迫的退隐状态，这位八旬老翁



得以重新享有他年龄较轻时发挥的那种影响。当然,他无法向世界完完全全地展示事态的压力加之于他的那种新历史观,但《德意志的灾难》(1946年)之类著作和《兰克与布尔克哈特》(1947年)之类演讲向我们表明,他感到必须对传统的历史思想作何等深切的修正,他又是何等无畏地面对它那令人不安的挑战和它提出的难题。

—

有一项事实确保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名字不仅在史学史上,也在更广泛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我们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支配德国达100年以上的哲学传统的终结。他本人喜欢将这传统说成经典自由主义,威廉·狄尔泰则创造了“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更鲜明、更适当的术语,并且在其中识别出了三大基本的和反复重现的哲学态度中间除唯物主义和“自由唯心主义”(idealism of freedom)以外的那一种。对客观唯心主义来说,世界不像唯物主义看来那样没有意蕴,但也不像自由唯心主义主张的那样从外界、从一个使之成形的先验的神性获得其意蕴,而是载有这意蕴在其本身之中。它充满着一种世界灵魂,后者以它为化身,在其中将自身物化,使它的每个断片和微粒赋有价值。宇宙被设想为类同人体和人的灵魂。它首先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甚至是一个有机体,其中每个肢体器官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功能。然而,它又不止是个有机体:正是这一点使此种哲学同某些唯物主义者的表面上类似的有机论区别开来;它无所不在,受一种精神原则激励,而这精神原则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 xvi

保证了它的和谐。这里的基调完全是乐观主义的：世界恰如——无论如何基本上有如——其应有状态。如果其中出现矛盾，它们就要么更多地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而能够被辩解过去；要么表现为臻于完美的和谐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因而假以时日就会被生活本身克服。客观精神永不真正自相矛盾，正如我们自己永不真正自我搏斗。在此，泛神论一词或许能够被当作方便的标签，用来称呼整个这种快乐的态度。

当迈内克相信这种欢悦的哲学时，它早已经历了很长的形成过程，而这形成即使不完全是，也大体上只是个德意志现象。决定性地为其国家提供这种哲学的第一人，是18世纪初期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他的关键概念——“既有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 虽然就其认定所有自然因素的协调归根结底来自全能创世主的神旨而言，一部分应归因于更早的一神论唯心主义，但已具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特性，因为它将不断和谐化的法则认作在世界本身内现时起作用的，而不是从上面和外界不断突入的。此后，由于伟大的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谢林和黑格尔，人格化的一神论残余被成功地清除出去，最后剩下的是被称为“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 的首尾一贯的观念体系。它所以被称作“同一性哲学”，是因为它断言归根结底并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一切现象无论在平常生活中可以表现得如何对立(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上帝与世界、我与你、实有与应有)，它们都是互相调和，而且的确是同一的——一种伟大、完整和合乎理想的统一。迈内克更多地是从诗人而非哲学家那里吸取了这套思想，尤其是从歌德那里吸取，而正是歌德赋予它依照其本性看来要求的艺术式表达。他的世界观受康德、席勒和费希特的著作显示的、残

留下来的自由唯心主义的影响小得多。这些著作在他看来这样那样地远离现实,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却探测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然而,年轻时候的迈内克所以全心全意地信奉莱布尼茨式的哲学传统,不仅是靠它在歌德诗作中的表现,也是靠,甚至更多地是靠它在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著作中所占的支配地位,而迈内克一生始终自认为是兰克的忠实追随者及其未来的继承者。在其多卷法国史、英国史、德国史和教皇史论著中,兰克不得不讲述的并非令人愉快的史事:阴谋和下毒,屠杀和残暴,拷问和捆绑,暗杀和绞刑——所有这些在其中起了太突出的作用。然而,尽管兰克会对遇见的邪恶感到愤怒,尽管他从来不宽恕这邪恶,但他并不真正为之惊骇。他被人说成是不敏感,说成是心肠冷漠,以致对散播在人类整个现代道路上的种种邪恶不会做出有力的反应。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他在历史的一切残忍面前所以表现得那么冷静沉着,真正原因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的哲学。他确信,只要我们往后退,使自己离历史图景有足够距离,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是最阴暗的色彩在这图景中也有其正当的位置,看到它们只是促使较浅的色调显得更为亮丽。他在1783年给儿子写道:“万物的秩序由神安排,这安排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证明,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相信天意乃一切信仰的概要和本质,对此我坚定不移。”在其《世界史》第三卷(1881年)的导言中,他更冷静地写道:“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一般人类历史的理想本质,那就是在各国各民族相反利益之间发生的斗争中,越来越崇高的力量脱颖而出。”显然,历史在他看来乃神意使然,就像弥漫着一种轻扬直上、活化万物的仙风,充满神的精神。

这种一般的万有在神论还出现在兰克关于政治生活的更为具体的理论观念中,例如由他 1836 年的《政治会话》表述的,而迈内克受此著作影响之深,甚至超过这位大师更为专门的历史著作。对兰克来说,国家乃神秘的生命本原的一种发散物,宇宙的一切可感知的现象正是从这本原中产生出来,而国家就是宇宙的一种个体化和具体化。它属于他称之为“真实理想”的那个领域,在其中我们看到理想被有形化,被赋予可感的形式,变为实体。国家就这样被解释为精神的凝结物。在其论文《历史和哲学》中,兰克表达了如下看法:“在权势中显露出一种精神存在”,而若考虑到所有先行命题,那么这不过是从根本的万有在神论前提出发得出的一项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结论。确实,国家,尤其是现代权势政治国家(the modern power-political state)不能不对兰克及其追随者迈内克有非常特别的吸引力;难道它不是恰如客观精神本身,以本原的权能奋力前行,趋向愈益伟岸的自我弘扬和愈益充分的自我实现?就如人们能够看出的那样,兰克学派的基本哲学包含着权势国家(the power state)的神化,其来源可能是清白无害的,但其效果必定变得危险。像兰克那样将国家——犹如个人的灵魂——称作一种“神的观念”,或者像迈内克后来将做的那样,<sup>①</sup>谈论其“伟大和道德尊严”,在课堂里或出版物上是无害的,然而这样的观念离演说家的讲坛甚或离战场究竟有多远?例如,倘若一个国家叫嚷要更大的“生存空间”,那么按照这种哲学,它难道不总是有理的吗?难道这叫嚣不是肯定会被解释成表达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并且由于有关国家的活力是那与神性同一的、更广泛的活力

---

<sup>①</sup> 《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1922 年版,第 279 页。

的一部分而成为正当吗？我们在此触及到对于下述问题的深层解释之一：这个拥有众多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如何，并且为何竟会变成一个街头暴徒和凶残流氓的国度？不幸，这一转变轻而易举，历史学家为其完成助了一臂之力。在光辉照人的兰克身后，背景中隐约浮现出险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且不说其他更险恶的人物），他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造了他的帝国。诚然，兰克认为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比使它们互相分离与不和的原因更有力，而且他希望它们的多样性和各自独特发展将最终导致“真正的和谐”。<sup>①</sup>然而另一方面，他不打算对主权国家设置限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削减其自主性。每个国家都必须彻底贯彻它自身固有的生存原理，如果在此过程中它陷入同别国的冲突，那么战争的考验就必不可免。

寓于其世界观根源处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兰克及其思想追随者们甚至不可能将战争视为一种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邪恶。战争，有如经验证明的那样，属于历史的常规事态；所有历史皆出于神启——在细节上或许不是这样，但在总的方向上是这样——因而甚至战争也必须以严格的一贯性被假定是善的：在“善”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这个学派的成员与其大师一起，由这么一连串思想指引，到头来便将战争视为一种道德力的较量，较量双方即使在最剧烈的拼搏中，也从不真正像必然的那样彻底分离，而是仍旧由它们都属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笼罩”；而且，双方经过这较量，它们的人格得到更清楚的规定，它们的生命特性得到有力的强化。在谈到兰克 1833 年的论文《论列

---

<sup>①</sup> 《论列强》一文结尾处。

强》时，迈内克如此写道：“谁不知道那些由兰克的勾画而一个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型角色（即现代国家）？它们如何时而积聚力量，时而互相碰撞，而且由于它们的剧烈斗争变得更加强悍精壮？”<sup>①</sup>在这段话里，战争被断言具有一种积极价值，好像它是某种由上帝规定的过程，属于精神和道德范畴，而非俗利和野心的领域，好像它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生灵涂炭，这些生灵无辜受难，几乎全然不知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一种思想方式  
 xix 同康德关于从未有过好战争或坏和平的看法有天壤之别！迈内克后来将为兰克的万有在神论的这些阴暗的含义而后悔，并且宣告弃绝之，然而在1918年以前，它像役使奴隶一般彻底支配着他。

假如有人在1906年或1907年告诉迈内克，说他并未像（依照兰克）他应该做的那样，“依其真实发生的方式”看待历史，而只是试图贯彻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那么他就会非常生气地大为惊诧。然而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的确是深深地沉浸在美好的光辉之中！一个小细节将比任何一般论说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我们的例子取自1906年出版的《德意志奋起时代（1795—1815）》一书。<sup>②</sup>在18世纪，战争失去了它的部分魅力。随着职业军队的兴起，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桩有目的的差事，成了受雇者的行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过后，它重获浪漫的光辉色彩。战争重新成为民族战争，战死沙场重新成为最崇高的牺牲。一个居住在敌国的侨民不再有可能像阿瑟·扬格曾在法国那样深信不疑，即使两国交战

---

① 《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第302页以下。

② 参见第108页以下。

他也是受到欢迎的，国王们之间的纷争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毫无关系。几乎没有任何不怀偏见的观察家会将这种事态发展称作并非令人遗憾或并不可悲的。被兰克式和莱布尼茨式乐观主义缠住的迈内克却将这看作是进步。他说，18世纪的军人是钟表机械而非活生生的人体。例如，弗雷德里克大王麾下的掷弹兵在检阅中表现得恰如无生命的木偶，而不像活人。经过格奈泽瑙、沙恩霍斯特和博延的改革——其时大众军队取代了旧式军队——整个这种情况就变得较好了。公民穿上军队制服，仍然一如先前，即仍然是一个有个性的人，道德的载体。如此，军队就不再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它变得比较像那个民族——一个精神实体，一个带有人类特性的真正的社会。也许对于所发生事态的这种解释并非全错，但它竟然为了一个次要方面而忽视了根本，只是因为这个次要方面比较契合认为世界全然美好和谐的先验哲学！

那些年里，迈内克是如此昧于事理，甚至没有发觉某些最基本的问题，那是任何关于历史的哲学分析都必定要被期望来探讨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政治行动中个人的意愿和责任同那些将其纳入和迫其脱离预选途径的超个人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力量被不同地说成是条件、环境、客观趋势、集体倾向等等。当时某些远不那么思辨的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回答，例如特赖奇克和西贝尔相信历史是人创造的，只要人足够了不起，他们就总会成功地使现实屈从于他们专横的意志；另一方面，兰普雷希特假定集体愿望支配个人，并将个人，至少是天性正常的个人视为超个人精神状态的一 xx 种表现和载体。迈内克虽然比较接近特赖奇克而非兰普雷希特的观点，但并不真正认为有必要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作选择，因为他将客观趋势与主观愿望、主观决定当作是由先验的和谐结合起来，并

且有幸得到调和的。他在《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延的一生》中<sup>①</sup>写道：“在弗雷德里克大王时期，统治者的个性与时代的智力意向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旧制度的成功。”而且，在同一部书里，他将这一随便做出的见解上升到一般原理的地步：“同一个观念在同一时候既表现为某一普遍运动的产物，又表现为某一个人的最个性化的行为——这确实是历史研究的伟大奥秘。”<sup>②</sup>这么一种态度蕴含着一整套社会哲学，它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通过亚当·斯密的经济信条为人所熟悉，这信条归根结底上溯到迈内克的历史乐观主义看法的同一起来源，那就是莱布尼茨式的“先验和谐”观念。<sup>③</sup>在年轻时候的迈内克看来，个人同社会冲突和社会挫败个人努力都没有什么危险。坚强、自作主张的个人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充分整合的社群，而不是软弱顺从的众多个人。他写道，<sup>④</sup>“个人需要社群，既是为了由社会来支撑和运载，也是为了将它内在的活力传入社群；他自己变得越自主，越个性化，……这些生命群体就会获得越丰富的内涵和越有力的外形。”这一令人欣慰的教义并不知道有这么一种人（不幸的是他们在现实中那么常见）：通常他们不断地给戏剧家和诗人提供素材，那就是与自己所处时代殊死搏斗的人，被历史和命运的磨石压倒和碾碎的人。

另一个历史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迈内克在1918年的事态迫使他予以思考以前不能领悟的，在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价值，而他

---

① 第一卷，1896年版，第152页。

② 同上，第125页。

③ 参见W.斯塔克：《经济思想的理想基础》，1943年版，论文一。

④ 《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1922年版，第9页。



在 1925 年所做的最彻底的自我批评性的研究之一,正是以此为论题。<sup>①</sup> 在任何时候,总有某些因果趋势在世界上起作用,总有某些事态发展在朝实现推进;同样在任何时候,也总有某些道德任务似乎被摆到人类面前,总有某些价值似乎要求实现。这两者如何并驾齐驱? 力争进入生活的,是否也就是生活应当产生的? 现实和道德彼此间的关系如何? 现实的力量是否在自己的突进中带动道德前行? 或者相反,它们是否与道德要求、道德义务背道而驰? 自由唯心主义(无论其为有神论的还是康德式的)同莱布尼茨、兰克和迈内克早期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比在这一点上更加截然相反的了。可以仅仅稍有夸大地说,对于 1906 年或 1907 年时候的迈内克,形成中的事物同时也就是应当形成的事物,即按照实践道德的要求应当实现的事物。黑格尔那简短的格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仍在他心中回响,仍审视着他的著作篇章。按照其他唯心主义(基督教的和康德式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世上的每一点善都要靠积极、艰巨的努力从现实中拧取出来,而按照迈内克的观点,善就像田园里的花朵那样自然生长。他在一篇早期论文中说,<sup>②</sup>“生活中最伟大的事物恰如最卑俗的,在因果连锁中有其位置,但最伟大的事物同时还处于另一种联系,即伟大的文化价值联系。对这联系的思索和鉴赏使我们摆脱一种苦涩的认识带来的痛处,那就是甚至一切精神发展都陷于一般自然过程的机理之中。”表面上看,这些话似乎带有一种悲观主义意味,但实际上,并且在本质上,它们是极端乐观主义的。它们主张的是,真善美之类伟大的文化

---

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历史杂志》第 137 卷(1928 年)。

② 《兰克评价》,1913 年,重刊于《19 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1918 年版,参见第 365 页。

价值出自自然,犹如结果出自原因,花朵出自茎,茎出自土壤:都是自发自生的,甚至是半自动的。诚然,绝不应当过分机械地解释迈内克的言辞。他始终懂得并且欣赏道德努力在世事中的作用,但在此时,道德努力对他来说并不具有对康德的那种含义,即意愿与生活的自发力量进行激烈的斗争。对他来说,前者大可说是后者的积蓄及其最高层次,而价值的实现只是广泛、连续、和谐、雄壮的发生之流的最高成就,一切现实就是从其子宫中释放出来。

所有这些观念在其中被最自信、最连贯地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的著作,便是迈内克的第一部巨著,题为《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sup>①</sup>,1907年出版。它像迈内克的所有主要力作那样,是对思想史的贡献,探讨1871年帝国创立以前120年里在国家问题上德意志思想的发展。在迈内克眼里,这是一部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一部越来越洞察国家的真实性质的历史。当它刚开始时,一般的德意志人,特别是他们的思想领导者,陷于所有各种过分理想化的、半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这些幻想对此严峻的、由利益支配的世界将毫无用处。他们不是将国家看作一种权势纽结,而是看作一种教育机构和道德载体。迈内克如此谈论冯·施泰因男爵:“他不想承认国家首先是权势,而权势依照其自身固有的冲动运行。”这描绘了整整一代人,而非一个人的特性。只是慢慢地,下述认识才影响渐增:国家犹如个体,并且事实上是一种个体,在世界上张扬自身,渴求享用给予它的生命——自由、充分和不受约束地享用生命;它是一

<sup>①</sup> *Weltbürgertum* 一词绝不应译作“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因为在英语里这些术语带有实在太凝重的意味。*Weltbürgertum* 意指“普天之下皆兄弟”、“手足之情”。这个词充满情感——那种在席勒的颂诗《欢乐》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可见的情感。

种不被道德说教遏阻和拘禁的个体,无论道德说教多么出于善意和哀婉动人;它将以压抑不住的勃勃生机和威力来自我展开、自我实现。最后,出现了三位“解放者”<sup>①</sup>——黑格尔、兰克和俾斯麦,他们使德意志政治思想符合政治现实。国家终于被赋予“自主”,被从道德的“异质”枷锁中解脱出来。迈内克非常赞赏威廉·冯·洪堡、席勒、诺瓦利斯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之类较老的思想家;确实,他赞同他们的唯心主义。然而,尽管有这种赞同,他仍然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称作“毒素”,说“如果(德意志)机体要重新自然地运行,它就必须排除这毒素”,并且将俾斯麦描绘为完成这一有益健康的净化工作的“医生”。<sup>②</sup>“现实政治”(Realpolitik)对这个时候的迈内克来说,就是唯一真实、唯一现实主义的政治。

关于往昔事态的这一描述在其基本轮廓方面,是与一切有教养的德国人对他们自己心理发展的看法大体相符的。他们都认为,自18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主义衰落,民族主义兴盛。迈内克的学术成就在于,他证明事情并不像看来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并非一种哲学消亡,另一种哲学诞生,而是存在着复杂得多的变化,需要高超的学问才能将其揭示出来。在德意志历史上,国际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我们在洪堡和席勒那里看到的经典形式,二是以诺瓦利斯等人为典型代表的浪漫形式。经典派“误解了”民族国家的性质和重要性,因为他们只是集中关注人道理想:他们倾心热爱 xxiii的是人类,而不是德意志人。有如席勒在一则对句中所说(奇怪的是迈内克竟未予以援引):

① 1922年版,第189页。

② 同上,第178页。

啊，德意志人，你们徒劳地要将自己组成为一个民族，  
你们应当竭尽所能，使自己更充分地成为真正的人。

浪漫派不关心所有人类，而只关心基督教世界。他们的理想是中世纪的普遍帝国——由教皇而非世俗统治者象征的帝国。然而，就民族国家及其“生存权利”而言，这种哲学到头来同另一种哲学完全一致。他们都瞧不起民族国家，都将其权势冲动视作不正当的和不可辩解的。

然而，尽管经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对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但它们也都如迈内克的分析所示，对德意志人民新生的民族主义及其建立德意志权势国家的成功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经典派的理想很近似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很近似于人民主权论。它将国家看作由“社会契约”发展而来，几乎是某种能够由组成国家的公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一个尚未拥有自己的国家、面临将自己组织进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任务的民族来说，采纳这种意识形态倒并不坏。不仅如此，它还是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凭其整个社会色彩，必定吸引广大的资产者群众，吸引中产阶级，使之接受一种政治行动纲领——创建国家的纲领，并且为这纲领将他们动员起来。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拒绝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只相信经久延续的东西，即传统。然而传统不仅招来出自往昔的、关于一个终究不复存在的普遍帝国的理想，也招来具体的、分别覆盖德意志民族领土的各邦国的现实，即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所有其余各邦国的现实。这些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浪漫派作家所崇敬。它们好，是因为它们业已成长，因为它们植根于大众精神的沃土，因为它们是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由一代代忠实和

爱国的人们塑造的,是先辈们智慧的现实结晶。在这些国家里,德意志人已经有了一种政治生活,而这对于一个如此易于追逐虚幻的普遍友爱、在政治上如此幼稚的民族来说,同样不是一件坏事。对这些具体的国家的忠诚在贵族中间最强烈,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一贯产生最能干的行政管理者,而且甚至在任何政治重建之后,也必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产生出来。如果这政治重建能够如此组织,以致将传统的各国保存下来,它就有希望不仅被迄今为止德意志最要紧的阶级——贵族——接受,还得到这个阶级的推进,并且得以成功。 xxiv

然而困难就在于此。如果旧国家要被保存下来,那么你能得到一个新国家?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在奥地利实际上被排除出去以后,麻烦本质上就在于普鲁士问题。也许可以设想,弹丸之地特克公国的一位公民应当学会既热爱自己那小小的特克祖国,又热爱自己更大的祖国——德意志帝国,但无法设想(至少对许多人来说如此)普鲁士人应当是除了普鲁士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普鲁士太大,不可能是帝国的第二小提琴手,但在普鲁士延续下来的情况下,帝国又断不可得。因此,特别在西南部兴起了一种要求,即普鲁士应当将自己献给德国统一的祭坛;实际地说,它应当解体,分裂为它由以组成的各个省。冯·加格恩兄弟之类人士觉得,只有旧生活被消除,新生活才有可能,无人能够一身事二主。用这个办法解决德国问题的努力构成《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下半部的主题,但决定性的困难仍旧同前半部里的一样。迈内克自始至终示意,要指望普鲁士这么强大健壮的“个体”自杀是有点政治、不讲现实和纯属空想的。加格恩之流纯粹是执迷不悟,始终不能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1812年12月1日,冯·施泰因男爵致函

明斯特尔伯爵：“用你喜欢的随便什么东西来取代普鲁士，解散它……这很好，只要能做到。”<sup>①</sup>但这是不能做到的——迈内克断言（与他后来要提议的截然相反）——恰如一个活生生的躯体不能被合法地肢解那样。不，只有在德意志的政治多样性同时被保存下来的情况下，德意志的政治统一才能实现。

不用说，在迈内克看来，是俾斯麦解决了德国问题，同时既未扼杀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原有形式，即具体的一个个国家，也未束缚其新的、更广泛的形式，即帝国。在他的成就之中，旧传统和新创造似乎和谐地得到了协调。迈内克并不属于这位铁血宰相的极端崇拜者之列，但他也向他的所有民族同胞们崇拜的圣坛献上了贡礼。从1871年危机中诞生的帝国被我们的历史学家赞颂为18世纪中叶以来德意志智力生活中可见的两大主要倾向的真正实现。它既被视为民族意愿的产物，又被当作一种成长于、植根于往昔的东西，当作德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资产阶级势力与贵族势力都可接收和珍爱的一个国家。绝妙的一招，在于使各成员邦国的代表组成的一个议会成为新宪法规定的主权机构。由此，旧的被整合进新的，新旧两者以某种方式归于同一，一切终将尽善尽美。

从这个观点看，甚至俾斯麦式解决的最险恶的方面都显得合情合理。德国内外的自由派阵营中，不反对1918年以前普鲁士政府那断然反民主、反宪政性质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在帝国各邦当中最大、最重要的这个邦国，人民大众对国务几乎毫无发言权。然而迈内克争辩道，如果俾斯麦使得普鲁士像帝国一样民主，如果譬如说他准予同样的普选权，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会有两个

---

① 《19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1918年版，第5页。

并立的议会,无法设想它们会永久彼此和平相处。正是靠着拒绝将现代国家的中央机构给予普鲁士,使之保持那么一点儿陈旧过时,这位天才设法构建了一部机器,其轮子肯定将和谐地转动,以便整个机器运行无阻。

当然,对 1871 年文治武功的整个这套解释,不过是迈内克总的普遍乐观主义哲学、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一个具体论题上的特别应用。同样可以对俾斯麦的帝国作一种全然不同的评估和解释,据此迈内克所绘图景中的黑白两色看上去颠倒过来。靠着使普鲁士保持民主以前的、专制主义的政权形式,这位在通权达变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中最通权达变的人物,设法使自由派和天主教徒,亦即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本质国际主义的居民完全不能影响国务;他还靠着在联邦国家内将普鲁士的全部分量投入军国主义和反动的秤盘,使开明的巴登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的进步力量永远保持虚弱无力,从而创造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威廉德国,其傲慢和侵略性必将毁坏世界和平。如果俾斯麦的创造物果真像迈内克主张的那样,是经典与浪漫这两大倾向和传统的综合,我们就必须问前者的普遍友爱信仰发生了什么情况,后者的基督教宽宏又发生了什么情况?无疑,在德国青年们为祖国的更大荣光而被训练为轻骑兵和长枪骑兵的操练场上,可看不到多少普遍友爱信仰和基督教宽宏!迈内克向我们保证,“普世主义观念”仍然作为“不可名状的生命气息”存在。<sup>①</sup>我们在此必须见谅,记住他是在 1907 年,即德国大军进军以前写下这些。然而,即使这 xxvi  
“不可名状的生命气息”有那么点似乎仍吹拂于德国上空,它也不

<sup>①</sup> 《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第 328 页。

可能很强,因为它太容易湮没于大炮的轰鸣之中。

并非那么多的民族主义导致了迈内克关于晚近德国史的错误图景(尽管民族主义与此有些关系),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自由派。导致这错误图景的,宁可说是他沉迷于其中的“经典自由主义”,是莱布尼茨-斯密-兰克式的思想体系,它设想在这可能有的最好世界里一切都趋于至善至美。在《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的全部 550 页里,没有比他论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一章结尾几行更有代表性的段落了。迈内克告诉我们,在施莱格尔那里,民族及其自决的概念被那些威胁着要将其窒息的思想紧紧缠住了。他接着写下了实质上是他全书概要的一段话:“人道主义启蒙的内涵已经是伦理性的和宗教性的。浪漫的普世主义同样是伦理性的,而且也特别是宗教性的。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气质时有不同,但它们都与旧制度下的国家(这种国家在他们看来是不道德的)为敌,并且都与权势政治国家本身为敌。它们都把在国家本性中发现的东西,把作为国家自保和自决的结果的东西,指责为对统治的盲目贪求。它们从外面进行道德说教,而不是试图内在地理解国家的性质;它们未能领会道德除了有其普遍的一面外,还有其特殊的和具体的一面,而且不懂在这后一方面,甚至国家的权势政治利己主义那表面上的不道德也能够是道德上正当的。因为,从一个存在的最深层独特性产生的东西不可能是不道德的。”<sup>①</sup>在关于迈内克这么一位伟人的讨论中,不轻易写下不客气的话语。但是,除了将这种态度称为愚蠢,还能怎样?大概较为年老的迈内克,1950 年时的迈内克——一位饱经沧桑、备受磨炼的人,会同意这样的评判。

---

① 前引书第 91 页往后。着重标记系本导言作者所加。



## 二

在迈内克 1916 年 1 月 27 日对柏林学院 (Berlin Academy) 所作的大胆的演讲(题为《德意志历史观变迁中的日耳曼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想》)之中,这一早期的乐观“经典自由主义”最后一次自我亮相。遵循兰克的观念,迈内克断言,尽管德法两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它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德法间的斗争 xxvii 只会有助于唤醒暂时休眠于这两个民族中的潜能。<sup>①</sup> 两年后,迈内克的情绪有了根本变化。1918 年 11 月 10 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下面几句话:“大坝业已决口。这是怎么搞的?说到底是由于客观的原因?”<sup>②</sup>虽然如此简短,但这最后一句使我们能够洞察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内心。它表明,他在同他年轻时候的“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分道扬镳,这种哲学确信万事万物都根据某种隐秘的原理协力促成尽善尽美。他现在开始明白,某些因果趋势在历史中运作,它们与人的理想和希望正相反对,并且是人不能控制的。<sup>③</sup> 实有与应有之间的分裂展现在他眼前。从此往后,他的世界观就是二元的了,包含怀疑和焦虑。

迈内克发觉自己在事态发展影响下不得不放弃的头一桩基本信条,就是他关于个人行为与历史客观趋势之间关系的构想。国

---

① 尤其参见重刊于《19 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1918 年版第 121 页上的最后一节。

② 《施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1901—1919):回忆往事》,1949 年版,第 271 页。

③ 尤其参见《革命之后》,1919 年版,第 10 页往后,那里有关于“因果铁链”、“不可规避的命运”等等的许多谈论。